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孙越生 李明德

副主编 童 斌 毛华田 丁玉灵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玉灵 王 宁 王祖望 毛华田 孙越生 孙 瑜
孙 新 李明德 陈书梅 黄强华 童 斌

撰 稿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宁 王祖望 毛华田 白玉英 孙越生 何培忠
李瑞华 李 薇 李吟波 陈一梅 陈书梅 沈仪琳
赵国琦 杨建国 胡 健 胜雅律 浦正东 黄巨兴
童 斌

编者前言

正名的必要

Sinology, 旧译汉学, 系指海外的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这是一门以汉族的语言文学, 中国的古代哲学、伦理思想、典章制度和文化风习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 译为汉学, 既指关于汉族的学问, 也指关于中国的学问。旧译译名倾向于以汉文化来代表中国文化, 所以, 名实之间不免有一定的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汉学”的内容日益扩大, 涉及的学科愈来愈多, 名实矛盾更加突出。编者认为, 除非历史文献中已然使用和国外机构自译名之外, 一般不宜再沿用“汉学”这一旧译, 而宜定译为“中国学”。理由如下:

一、“汉学”本来指汉代的训诂之学, 又称“朴学”, 如今又用来指汉族学和中国学, 易生混淆。

二、中国研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扩及中国的各个方面, 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所有部门, 已远非“汉族的”一词词义所能涵盖, 有许多研究对象根本与“汉或非汉”的问题无关。例如, 外国研究中国能源问题的著作, 就难以称之为“汉学”; 又如, 把论述中国统计制度、人口问题等全国性问题的文章称之为“汉学”, 就使人感到凿枘不入, 远不如称为“中国学”来得贴切。

三、需要强调的是,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 由于千百年来长期融合的结果, 早已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后, 各民族一律平等, 汉族虽是其中最大的一

支，但并不能等同或替代中华民族。如果把汉族和中国划等号，这一方面犯了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另方面又会授人以柄，给那些认为中国领土限于汉族聚居地的人提供借口。所以，把研究中国的事物称为“中国学”，而不再称为“汉学”，把Sinology的中译名订正为“中国学”，其必要性绝不应等闲视之。

四、“汉学”这一译名的色彩，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有余，而给人以时代感则大有不足。当今世界中国研究的重点，虽说传统中国的魅力未减，但已明显由古代中国转移到现代中国；其热点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科技等体制的改革问题，倘若仍然把这类研究称为“汉学”，把这类研究者称为“汉学家”，就好象硬要小脚女人充当现代时装模特儿，看起来很别扭。

五、国外中国学是一种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它不仅仅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研究的机械总和，也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的各种专门学科的机械总和，除此之外，还应该是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研究的有机总和，以整体地把握或局部综合地把握中国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或功利目标，这是任何一个专门学科单独研究中国时所难以追求的目标。所以，中国学不仅仅需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而且也需要培养自己的通才。世界的中国研究，从狭隘的汉学演进到今天包罗万象的中国学，完全符合科学在频繁分化中同时进行广泛综合的新趋势。这种新兴的综合性地域研究(如中亚研究)和国别研究(如日本学)，不会完全等同于各学科的机械总和，而是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层面或课题。例如，关于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研究，就是中国学的课题之一。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例如元、清政权，与它们所承续的汉族政权，既有区别，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整体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机发展阶段。因此，既不能把它们割裂为只属于蒙古学、满学的课题，更不能称之为汉学的课

题,按照循名质实的原则,只能称之为中国学课题,才最为适宜。

不仅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如果只研究政治而不同时综合地研究其他有关对象,如中国传统经济,就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大一统特点赖以构成的最主要根据。又如,如果不同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被称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的儒学,就既不可能了解政治对文化的利用机制,也不可能透彻了解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及其行为模式。而如果不能鞭入里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也就很难透彻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乃至中国的其他许多问题。一国中国学水平的高低,按其功利目的来说,最终必须在这类带有综合性的核心课题的研究上才见分晓。即使对中国人自己来说,也必须以这类核心课题的研究作为了解基本国情的关键。

严重的挑战

现代海外中国学的发展规模与成就,已经达到绝对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甚至达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

一、有一支可观的学者队伍在研究中国。当今海外在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学会、协会、社团等公私研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研究工作,以及退休后个人仍继续从事独立研究的中国学家,其水平相当于西方助理教授或高级讲师、独联体副教授以上者,总数不会少于一万人。这支高级的万人学术队伍,虽然为数不如我国研究自身问题的专家学者队伍庞大,但也为数可观,堪称伯仲了。而且,这支队伍每年以数百名中国研究硕士和上百名中国研究博士的规模在扩充自己。这一增量,绝不少于我们自己每年毕业的中国研究硕士与博士的数量。中国的优势在于自学成才者为数众多。

二、有众多的国家和机构在推进这一事业。据美国社会科学

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所属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前负责人林德贝克在题为《了解中国：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评论》（1971年）的一个调查报告中称，在60年代末，全世界具有充足设备和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研究中国的国家计有12个，“它们是美国、苏联、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另有香港地区和19个国家在高等教研系统中设置若干研究机构，进行一定限度的中国研究。“它们是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马来西亚、挪威、菲律宾、波兰、新加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智利、芬兰、印尼、墨西哥、韩国、泰国、新西兰。”鉴于近十余年来，中国实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进行众多领域的国际交流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促使关注中国研究的国家与机构有增无减。这些年国际上一再兴起“中国热”就是证明。目前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其机构数，如果把军政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亦包括在内，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个。其中公开出版过中国研究著作的机构，亦至少有五百个。

三、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自从16世纪西欧传教士大批来华开始，在海外陆续发表的中国学书简、笔记、报告、论文、专著、译著、工具书和教科书，以及外人在华发表的中外文中国学著作，据保守的估计，文献量累计不会少于20万种。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所有部门，中国古代和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各个领域，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中国的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都有专题著作。按时间跨度说，不计地质学年代，而以人类学纪年来看，从元谋人、北京猿人，到20世纪80年代昆明东郊的撒梅族，上下数十万年，都有专题研究。以有史记载而言，从夏商周三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间历朝历代史事莫不问津。对中国的活语言有研究，对中国的死语言，

如西夏语，也有研究。甚至某些“中国专利”部门，如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著版本研究等，也频繁问津。这种敏学好求的精神，使研究呈现出异常生动活泼的气象，给科学的辩证发展也提供了活力，开拓了视野。国外中国学有现代化的先行经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提出值得借鉴的见解，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方便的服务。海外中国学的优势除了表现为绝少禁区限制和有现代化的先行经验外，首推有丰富的中文藏书和先进的服务设施。据我们估计，海外中外文(包括汉、满、蒙、藏、朝等中国文字)中国学藏书不会少于千万册之数。一般都相对集中，便于利用。仅美国就至少有500万册以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的地区分布大体与东亚藏书的地区分布一致，说明充足的图书情报资料供应是海外中国学的主要依托之一。其利用图书资料的方便程度，令我们望尘莫及。这不仅指借阅便捷，而且指编制了种类繁多的索引、专题书目、工具书等，足以对学习研究进行指导。此外，海外除大量出版中国学书籍外，还有数百家报刊经常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有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的中国学机构经常召开学术研讨会，促进学者间的切磋交流。

面对具有如此规模和生气勃勃的海外中国学，如果象过去那样采取闭目塞听的政策固然很不明智，即使我们采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开明态度，也已经不够开明了。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未必全是美玉，他人的研究岂能都是顽石。在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放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日本在中曾根康弘先生的倡导下，在他卸任首相前就成立了一个广泛利用“外智”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不失为得风气之先的英明之举。

如果说，海外中国学对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研究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挑战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的海外研究来说，就更是一面使国人相形见绌的镜子了。所以，充分介绍海外中国学的情

况，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对自身的研究，而且也可以激励我们加强对海外的研究。

合乎规律的希望

任何国家的中国学，客观上都受本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两国关系的制约。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也在顽强地为自己开辟展示的道路。这两方面都有客观规律性可循，并有相通之处。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屡经沧桑，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也代有更迭。自秦汉迄于盛清，中国在外国人眼里，总的来说是一个先进大国的形象，甚至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大帝国。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被欧洲一些不满本国腐败政府的知识分子当作天语纶音来称颂，虽然这里面大有把自己的理想冠以中国名称的意味。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国学是以好奇和赞美的心情，以及大量译译中国典籍为主要的特征。

但是，到了18和19世纪之交，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已由封建社会迅速进入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工商社会。而中国则仍旧停留在封建专制官僚统治阶段。所以，从此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就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发现中国是个“空间的国家”（黑格尔），即时间上是停滞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封建主义的中国之间的差距加大和列强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实施，它们的代言人就完全把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十足的“东亚病夫”。这时期的中国学是以侵略的需要和歧视的态度为主要的特征。当然，与此同时，在殖民主义的喧嚣声中，中国学中科学的、民主的思潮仍然孜孜不倦地在继续开拓自己的道路，许多严肃的中国学家，写下了不朽的著作。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显著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屈辱历史宣告结束，中国被视为“明天的强国”（威廉·富克斯的同

名著作)。所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除了上述两种特征还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延续外,西方的中国学,总的看来,则是越来越倾向于要求客观地、科学地和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科学的这种要求排除政治干扰而自我发展的民主化趋势,当然也和二战后西方世界科学与民主的潮流蓬勃高涨有关,但也与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变化有关。

历史多次证明:正确的中国学结论有利于制订正确的对华政策,而正确的对华政策,在中国也有知己知彼之明的情况下,就会对两国都产生有利的结果。反之,不正确的中国学结论则易于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而错误的对华政策,则会使两国都蒙受其害。

正因为我们认定发展科学的中国学最终有利于中外双方,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所以,我们认为促进中国学的外中交流是明智的和有益的。本名录的编辑与出版,就是为达到这个目标尽绵薄之力和走出的初步。

几点说明

(一) 由于缺乏经费,本名录必须限制在50万字的篇幅之内。为了多选收一些中国学家,不得不在著录内容上大为压缩。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作较大规模的增补再版工作来弥补国别、人物和著录内容上的空缺和不足。现共收录海外21个国家的中国学家1434人。著录内容:(1)原文姓名,译名或汉名;(2)通信地址;(3)出生时间和地点;(4)学历;(5)经历;(6)著作,尽量著录原文。著录人物以1991年在世者为限,但也可能有不知其已经故世而收入者。

(二) 由于经费所限,无法采取大规模发放问卷的办法收集资料,更不必说出国进行广泛的调查与收集资料了。所以,有的资料比较陈旧,有的资料残缺不全,希望行家指正。

(三) 本名录在编写过程中,适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

中心研究员赵国琦教授在俄国进行访问，承他鼎力相助，并承俄罗斯科学院社科情报研究所的Т.И.尼基京娜、Л. А.波格丹诺娃、Н.Н.富尔马诺夫；远东研究所的А.М.格里戈里耶夫；东方学研究所的А.А.博克夏宁；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的Г.З.蓬皮扬的大力协助，发出了300份问卷，回收了108份问卷，使俄国学者的条目得到补充与订正。特在此向他（她）们和填写问卷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些问卷的材料，还将在编辑中的《欧洲中国学手册》里得到更充分和详尽的利用。

（四）我们对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杜克义表示深切感谢。他提供了匈牙利中国学家的不少宝贵资料。

（五）本名录得以问世，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研究员王祖望教授的鼎力支持，他熟悉很多种外语，对欧洲中国学家素有研究，没有他的贡献，欧洲部分的这些学者简介就难以完成。

（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的孙健、曾东、潘小根、吴波龙也参加了部分书稿的审阅工作，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七）本名录分国别和按各国英文名称的字顺排列，每个国家的学者一般按该国语言的字顺排列。

（八）在题录学者的经历和著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机构与著作的名称有悖于我国“一国两制”等现行政策者，或带有反华色彩者，但为了给读者提供全面的概念和如实的信息，我们既不作删节，也不作加引号等处理，这并不表示我们对此采取承认或赞同的态度，相信读者也会作出正确的理解。

（九）最后，还由于经费短绌带来的印刷条件的限制，在本书铅字字体上不很统一，特别在移行规则的遵守上，未能尽如人意，敬希读者鉴谅。

编者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

澳大利亚(Australia).....	(1)
奥地利(Austria).....	(2)
加拿大(Canada).....	(4)
捷克和斯洛伐克(Czech and Slovakia).....	(13)
丹麦(Denmark)	(16)
法国(France).....	(17)
德国(Germany).....	(53)
匈牙利(Hungary).....	(83)
以色列(Israel).....	(89)
意大利(Italy).....	(89)
日本(Japan)	(10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Kore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145)
大韩民国(Korea, Republic of).....	(147)
马来西亚(Malaysia).....	(157)
荷兰(Netherlands).....	(158)
挪威(Norway).....	(163)
俄罗斯(Russia).....	(164)
瑞典(Sweden).....	(242)
瑞士(Switzerland).....	(246)
英国(United Kingdom).....	(251)
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69)

澳大利亚

Australia

ADIE, Ian William
Andrew Charles 艾迪言 76
Canadian Bay Road, Mt.
Eliza, Vic. 3930, Australia.
1926年2月生于伦敦。1953 获牛津
大学硕士学位。1953—1959任英国
外交部二等秘书, 1960—1970任圣
安东尼学院研究员。1970起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1981—
1991澳大利亚管理学院教授。现任
企业管理和公共行政改革顾问。通
晓法、德、意、西、希、日、俄和中
文。是国际著名杂志的撰稿人和编
委。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澳大利
亚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研究学
会、英国东方学家学会、国际东方
学家大会会员。曾应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等机构邀请来华讲学。著有
《Chinese Strategic Thinking
under Mao Tsetung》(毛泽
东领导下的中国战略思想);
《Youth,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的青年、教育与政治);
《Chairman Mao's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Line》(毛
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China's
West Asian Strategies》(中国的
西亚战略)。

FINCHER, John
Howare 芬彻 汉名 傅因彻
Far Eastern History PO
Box4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1939生。
1959哈佛大学学士。1969华盛顿大
学史学博士。1963—1970美国务院
外事官员。1970起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助理教授至教授。1971美参议
院顾问。1973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任
教。著有《Chinese Democracy:
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 Pro-
vincial & National Politics,
1905—1914》(中国的民主: 1905—
1914年地方、省和全国政权中的自
治运动);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1913》(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1900—1913年);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变化
与持久性: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SIEGELBAUM, Lewis
H. 西格尔鲍姆 Department of
History La Trobe Univer-

sity Bundoora Victoria Australia 1949生于美国纽约。1970哥伦比亚大学学士。1975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1980起澳大利亚拉特罗贝大学任历史学高级讲师。著有《Another Yellow Peril: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Before 1917》(另一个黄祸: 1917年以前在俄国远东的中国移民)。

TEIWES, Frederick
泰维斯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Sydney, Sydney NSW 2006 Australia 1939生。1961阿默

斯特大学文学学士。1917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著有《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中国的政治和清洗: 整风和党员标准下降, 1950—1965年); 《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 1956—1966》(中国大陆省级党员干部, 1956—1966年); 《The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 Inner-Party Purges and Education before Liberation》(整风的由来: 解放前党内的清洗和教育)。

奥 地 利

Austria

KAMINSKI, Gerd 卡明斯基 Lange Gasse 35a, A-1010 Wien, Austria 1942年12月14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 律师。1971参加创建奥地利中国研究协会并任该会管理委员会委员; 1978维也纳大学国际法讲师, 路德维希·博尔茨曼协会中国和东南亚问题研究所所长, 并在该所教学班上讲授中国外交政策、奥中关系史等课程。他也是奥中友协秘书

长、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学会会员。并有《Chinas Völkerrecht und Aussenpolitik: Historische Grundlagen》(中国的国际法与外交政策: 历史上的基础情况); 《Von Österreichern und Chinesen》(奥地利人和中国人) (和燕珊合著); 主编《Neutralität in Europa und Südostasien》(欧洲和东南亚的中立); 与奥斯卡·韦格尔 (Oskar

Wegger)合编《China und das Völkerrecht》(中国与国际法)。

LADSTÄTTER, Otto
罗致德 Institut für Sinologie,
Rathausstraße 19/9, A-1010
Wien, Austria 1933年2月22日
出生于奥地利蒂罗尔州弗里尔施。
1960慕尼黑大学中国学博士。1973
起维也纳大学中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著有:《P'u Sung-ling,
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 in Umgangssprache》
(蒲松龄: 他的生活及其使用俚
语写成的作品);《Der Sprach-
silbenbestand des modernen
Chinesischen Hochsprache-
Laut-und Tonsystem》(当代
标准汉语声音及语调的构词音节情
况);《China und Japan》(中
国和日本)。此外,为一些专业刊物
撰写了不少学术性论文。

STEINKELLNER, Ernst 施泰因克尔纳
Reisner-
straße 6/14 A-1030 Wien,
Austria 1937年10月3日生于奥
地利格拉茨。1963获维也纳大学
主修藏学的博士学位。现任维也纳
大学藏学与佛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编译有
《Śāntideva: Eintritt in das
Leben zur Erleuchtung/

Poesie und Lehre des Ma-
hayana Buddhismus. Hrsg.
und übers. von Steinkell-
ner, Ernst》(寂天: 进入顿悟之
一生——诗歌与大乘佛教的学说)
等藏学书籍;此外也给维也纳出版
的一些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刊物撰写
一些学术论文。1977年起负责编
辑德文杂志《维也纳藏学与佛学研
究》(《Wiener Stud. zur Ti-
betologie und Buddhismus-
kunde》)。

UNTERRIEDER, Else
燕珊 Lange Gasse 35a. A-
1010 Wien, Austria 1937年生
于德国,1955—1960北京大学攻读
汉语和中国文学。后在民主德国对
外友好联络单位负责对华工作。
1971移居奥地利,并加入奥国国籍。
现任奥地利路德维希·博尔茨曼协
会中国和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副所
长,在该所教学班上讲授中国艺术
课程。并任奥中友协副秘书长,来
华20余次。著有《Von österrei-
chen und Chinesen》(奥地利
人和中国人。)与格尔德·卡明斯基
合著);《Glück ein ganzes
Mondjahr lang. Chinesische
Neujahrsbilder und ihre
Bedeutung》(恭贺新禧——中
国的年画及其意义。)

加 拿 大

Canada

BOARDMAN, Robert 博德曼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Dalhousie University Ealifax, NS B3H 4H2, Canada. 1945 生。1966 伦敦大学学士, 1970 国际关系博士。1982 起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政治学教授, 外交政策中心主任, 著有《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英国和中国, 1949—1974 年); 《China's Rise as a Nuclear Power》(中国作为核大国的兴起); 《Conflict in Western Perceptions of Change: Two Profiles of China》(西方变化观中的冲突: 中国的两个侧面)。

BOYD, Monica 博伊德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ON K1S 5B6 Canada. 1944 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65 芝加哥大学文学士。1968 杜克大学文学硕士, 1971 社会学博士。1970 起卡莱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著有《The Chinese in New York, California

and Hawaii》(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华人); 《Oriental Immigr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Filipino Populations in United States》(东方的移民: 美国的华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

CHEN, Jerome 陈志让 University of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 Founders College, York University, 4700 Keele Street, Downsview, Ontario, Canada, M3J 1P3 1921 生于四川成都。1943 西南联大经济学学士。1945 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1956 伦敦大学哲学博士。1971 起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多伦多-约克大学近代东亚联合中心主任。1980 起加拿大皇家学会第二学院院士。著有《Yuan Shih Kai》(袁世凯);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Mao》(毛泽东);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史研究);《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毛泽东文集和书目);《China and the West》(中国和西方);《The Military-Gentry Coalition—the Warlord Period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军人和绅士的联合——中国近代史上的军阀时期);《军绅政权》;《Stat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1840—1895》(清政府的国家经济政策1840—1895年)。

CHEN, Min-sun 陈民荪 Department of History Lakehead University Thunder Bay ON P7B 5E1 Canada. 1921生于中国湖南长沙。1946清华大学学士。1959芝加哥大学硕士, 1971史学博士。1977起加拿大莱克赫德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著有《Chin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17世纪初的中国);《Ho Lung, 1896—1969 and Norman Bethune, 1890—1939 in North China, 1938—1939》(1938—1939年贺龙[1896—1969年]和白求恩[1890—1939年]在华北);《China Insight,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Canadia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82—1984》(中国透视: 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会议录论文选, 1982—1984年)。

CHING, Julia C. 朱莉亚

· 荆 (音)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M5S 1K7, Canada. 生于中国上海。1958东罗彻尔学院学士。1960美国天主教大学硕士。1971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哲学博士。1981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著有《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王阳明哲学书简);《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儒教和基督教)。

GRANMER - BYNG, John L. 克兰默-宾 Department of History Sidney Smith Hall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M5S 1A1 Canada. 1919生于英国。1941剑桥大学学士, 1944硕士。1951香港中文大学毕业。1956—1964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66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乾隆朝英使马戛尔尼伯爵使华日记, 1793—1794年);《Chinese Buddhist Verse》(中国的佛教经文);《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Collision: Scientific Apparatus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3》(文化冲突事例研究: 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使华时的科学机构);《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External Relations》(中国对外关系的态度)。

CROIZIER, Ralph C.

克罗泽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C V8W 2Y2 Canada. 1935生。1957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士。1960华盛顿大学硕士。1964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史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Koxinga &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 the Hero》(郑成功和中国的民族主义: 历史、神话和英雄);《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党中国的中药);《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国的中药);《China's Cultural Legacy and Communism》(中国文化遗产和共产主义);《The Thorny Flowers of 1979: Political Cartoons and Liberalization in China》(1979年多刺的花: 中国的政治漫画和自由化)。

DOLEZELOVA-VELI-

NGEROVA, Milena 多列泽洛娃—维林戈洛娃 308 Carlton St Toronto ON M5A 2L7 Canada. 1932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1955查理大学学士。1965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传统中国小说博士。1958—1959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从事研究。1980起欧洲基金会《近代中国文学计划》编辑。现任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著有《Lu Xun's Medicine》(鲁迅的医术);《Typology of Plot Struc-

tures in Late Qing Novels & 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类型学和晚清小说的叙述模式);《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世纪转折时的中国小说);《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近代中国文学的起源);《Ballad of the Hidden Dragon》(藏龙谣)。

EVANS, Brian 埃文斯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Alberta Edmonton AB T6G 2G2 Canada. 1932生于加拿大艾伯塔。1954艾伯塔大学硕士。1961伦敦大学史学博士。1973—1974加拿大驻北京使馆参赞, 1974—1976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秘书兼司库。1973起艾伯塔大学历史学教授, 曾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著有《Ginseng: Root of Chinese-Canadian Relations》(人参: 中—加关系之根)。

FALKENHEIM, Vic-

tor C. 福尔青海姆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5S 1A1 Canada. 现任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政治学教授兼系主任、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东亚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著有《Fujian's Open Door Experiment》(福建的对外开放实验);《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中国的政治改革);《Democracy, Modernization, and Participa-

tory Values in Post-Mao China》(毛以后的民主、现代化和参与价值);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Fukien, 1949—1966》(福建省的领导, 1949—1966年); 《Bureaucracy, Fac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中国的官僚政治、派系和政治变化); 《Continuing Central Predominance》(继续的中央集权统治)。

GERSON, Jack J. 格尔森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 M5S 1A1 Canada. 1921生于美国纽约。1947德鲁大学学士。1954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硕士。1967伦敦大学远东史博士。1967—1968香港大学讲师。1975—1976伦敦大学中国史客座讲师。现任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李泰国和中美关系, 1854—1864年); 《A Century of Struggle》(斗争百年)。

GEWURTZ, Margo Speisman 格沃茨 5 Bruce-dale Crescent Willowdale ON M2K 2C6 Canada. 1943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65多伦多大学学士。1968康奈尔大学硕士, 1972中国近代史博士。1975—1977多伦多—约克大学近代东亚联合中心执行委员, 1980起约克大学东亚研究计划协调人。现任约克大学历史和人文学副教授。著有《Between

America and Russia Chinese Student Radicalism and the Travel Books of Tsou T'ao-fen, 1933—1937》(美俄之间, 中国学生的激进主义和邹韬奋1933—1937年的游记); 《Educa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Reality: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17—1927》(教育改革和社会实际: 中国的职业教育团体的案例, 1917—1927年); 《Do Numbers Count? a Report 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hristian Converts of the North Henan Mission, 1890—1925》(一份关于豫北布道团发展教友的初步调查报告, 1890—1925年)。

HAYHOE, Ruth 海霍 汉名 许美德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Bloor St West Toronto Ontario M5S 1V6 Canada. 1945生于加拿大。现任职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研究院。1984伦敦大学比较教育学博士。1985来华研究中国教育情况。1987再次来华考察1978—1986年间中国教育的演变及重大政策的变化。1989—1991任驻华使馆文化一秘。著有《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Cultural Dynamic of Sino-Western Educational Cooperation》(中西教育合作的文化动力比较研究)。

HO, Samuel Pao-san